

解密天安门城楼开放历程

天安门城楼,从封闭到开放,对82岁的杨登彦来说,别有一番感受。

21年前,身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杨登彦,负责联系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他是天安门城楼开放的筹备人员之一。

2008年12月26日,忆起当年的筹备工作,杨登彦说:“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向人民开放,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开放!”

封闭 部委领导上天安门都很难

杨登彦一连用了几个“确实不一样”,来形容天安门城楼的开放。

他说的“不一样”,主要是区别于人民大会堂和友谊商店的开放,所谓“一间礼堂、一家商店、一座城楼”。

杨登彦说,这三个地方的开放各有特点,但那两个都不好和天安门比。对中国人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从神坛走向普通公众,是最大的变化。

1979年大会堂的解禁,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次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开始试办经济特区。

此时,“开放天安门城楼”的意识,也在高层有所松动。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就提议,是否可以将天安门城楼向群众开放。但是,由于观念和客观条件不成熟,这个想法被搁置下来。

杨登彦说,那时天安门城楼只在领导人接待外宾等重大事情时才启用,平时都是封闭管理。天安门管理处事情也很少,长期只配有8个人。

4年后,来自民间的一封

信再次响起“开放天安门城楼”的呼声。

1984年9月,一封署名“华兴”的信,放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桌上。信中有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

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封信受到胡耀邦和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

在多位领导人圈阅后,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批示:“请北京市提出具体意见,报中央审批”。

1986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始有组织地接待参观者。

当时的参观者,主要是中央或驻京部队一些会议的与会者、人大代表或劳动模范。参观必须提前登记,有严格的审批手续。

“那时人们把上天安门城楼当成荣耀。这次能上、下次不能上,有人就会考虑自己是否出了问题。”杨登彦说,各部委的领导想上天安门都很难,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登楼。

当时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的冯人凯曾回忆,在开放前,所有为城楼做日常保洁整修的登楼人员都在中央警卫局备案,均需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每次登楼前都要电话向中央警卫局请示。

决策 从报告到获批只用3个月

时间到了1987年。因为次年恰逢龙年,北京市旅游局就把1988年定为“北京国际旅游年”。时任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希望“头一炮一定要打

响”。他找到杨登彦,商量开放天安门城楼。

杨登彦说,从写报告到获批,只有3个多月。“之前已有很多铺垫,这次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向市委市政府写了报告。

9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从1988年北京国际旅游年起接待外宾参观天安门城楼”。

随后,王震等几位领导人先后批复“同意”。

1987年国庆后,杨登彦正式通知天安门管理处:为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

薄熙成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他用了一句成语来形容:“势如破竹”。

布置 大客厅弃用开国大典油画

接到筹备开放的通知后,天安门管理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布置天安门城楼。

之前,除了“五一”、国庆或春节领导人登临外,天安门城楼上就像是一个大仓库。彩旗、灯笼、屏风……

这些集会上要用的东西就堆放在城楼上。仅阴阳对直径25米的大红灯笼,就占了整整一间房。

东西搬走后,面对整饬一新却空空如也的城楼,该怎么布置?这时,市里的意见批下来,简单明了:“就按开国大典时的样子布置”。

桌椅、沙发、茶具、挂钟、屏风……每件都按开国大典时的摆放。杨登彦说,筹备工作其实从35周年国庆时就开始了。为了和天安门配套,他们把原来的电灯改为宫灯、原来是白色的软

沙发换成了楠木为框的沙发。

当时还有一个让筹备人员犯难的问题:城楼上的大客厅,墙壁上挂什么?“不能太政治化,但也不能不政治化。”杨登彦说,天安门城楼本身是个政治性很强的地方,当时考虑正面不放开国大典油画,感觉太正,只能放侧面。他们考虑正面放一幅大山大河的油画。

杨登彦找来中国文联副主席尹瘦石,尹的画和柳亚子的诗曾被评为“柳文尹画”。“大山大河的画作,有时候是一种抽象的描写,反映一种气势。”随后,他们又请来了田世光、郭怡宗、王庆生三位大画家在城楼上挥毫。屏风上的牡丹、翠竹、腊梅……

看起来美观又庄重。一些细节显示出天安门管理部门对筹备工作的周密考虑。他们将大厅里原来铺设的纯毛地毯换下,在游客行经的所有地方铺上红色的化纤地毯。这样设计有两个好处:一是游客迈出的每一步都走在红地毯上,就像走向一场盛大的仪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毯对青砖地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开放 “不高调,小范围搞点活动”

1988年1月1日,正式开放的日子。天安门城楼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剪彩仪式,没有领导人参加。

杨登彦说,当时他与薄熙成商量的是“不高调,但还是小范围搞点活动”。

当天清晨,薄熙成从北京饭店拿来一对景泰蓝花瓶,并附带两份证书。两个花瓶有一尺多高。杨登彦记得“样子很漂亮,挺大气”。

当时的门票是对折的,像请帖那样。票面上印着烫金的

天安门城楼剪影。售票处门口,还铺着大红地毯。

开放的消息早就向社会公布了。当日清早5时,天安门的值勤人员便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值勤人员忙迎上去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反问——“今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开放,你不知道?”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董保存描述,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根本无法体会到排队时那种庄严肃静的气氛。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似的。

登楼的第一位普通人是北京东四人民商场的退休老职工,75岁的高希武。他早上7点就等候在登楼售票处前。9点,当他缓步登上城楼后,接受了薄熙成赠送的“登城楼证书”和花瓶。

接受同样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游客卡特夫妇,他们是第一批登上城楼的外国旅游者。

定价 票价十元是为保护历史建筑

1988年天安门城楼开放时,人民大会堂的票价是三角,颐和园是一元,故宫是五元。天安门的票价该定多少?这是个经过反复讨论的问题。

薄熙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不记得为这个问题开过多少次会。绝不是谁一拍脑门就能定下来的。”当时有两个听起来相互矛盾的定价原则:一,票价不能太高,要让普通百姓买得起;第二,票价不能太低,要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参观的人数,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最终,北京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这样的决定:外宾每人40元;1988年龙年旅游年优惠票价为30元。内宾每人10元。

杨登彦回忆了一个细节,从侧面证明天安门城楼的票价问题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关心。

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罗干曾给杨登彦送来10元钱,并附着一封信。大意是:登彦同志,上次我登天安门城楼没有拿钱,但这次决定天安门收费的会议我是参加的,现在补上10元钱。

杨登彦说,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天安门的收费并不仅仅是由北京市决定的。

和当时人们每月几十元的收入,以及其他景点的票价相比,天安门十元的票价并不便宜。北京市旅游局一度担心这会让人望而却步。不过,随后的滚滚参观人流打消了这一担心。

1988年元旦,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两千多人。当月,38253人次登上城楼,带来超过40万元的收入。开放头一年,天安门接待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

随着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天安门管理处的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摆脱了一直依靠财政全额拨款的局面。

在天安门城楼开放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开放在更大的棋盘上布局:1988年年初,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

同年3月4日,沿海经济开放区继续扩大。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市县总数增加到288个,人口增加到1.6亿。

同年4月,海南省建立,并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经过那么多年,天安门城楼由禁地走向开放。从天安门到海南岛,见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据《新京报》

山西省山阴县被指瞒报矿难

近日,有知情者向记者举报称,2008年12月5日晚9点,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马营乡青羊岭村辛庄煤矿发生一起严重透水事故。事故发生后,该矿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上报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积极的救援行动,而是连夜把所有矿工转移或遣散,导致井下至少有30人遇难。此矿难事故被举报后,2008年12月8日,当地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驻该矿进行事故调查。但时至今日,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遇难矿工人数一直没有公布。举报人称,山阴县政府有故意瞒报这起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嫌疑。

2008年12月22日,记者前往事故发生地山阴县调查采访。

违法生产突发事故?

记者了解到,辛庄煤矿全称为“山西山阴辛庄煤业有限公司”,此前为山阴县北周庄镇辛庄煤矿,年生产能力为15万吨,获批准开采6#、9#、11#煤层,柴政任矿长。据山阴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煤矿是属于资源整合型的矿井,早就停产了。

辛庄煤矿2008年6月28日已经被责令停产,至今没有获发复产通知书。此次矿难事故发生后,由于消息被封锁,事故死亡人数目前不详。不过,山阴县相关部门领导承认事故属

实,已经按程序逐级上报到各级相关部门。事故发生后,朔州市辖区内煤矿全部停产。

据了解,12月8日,接到上级通知后,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进驻该矿。目前,发现井下9#煤层有水,由于该矿没有积极上报,井下水原因不明,具体井下有无人员伤亡,只能等到排完水后才能清楚。

12月22日下午,在知情人老王的带领下,记者顺着山谷里一条布满鹅卵石的小路到了山阴县马营乡青羊岭村,远远看到这里的村民大都居住在依山而建的土窑洞或用石头垒成的窑洞里。辛庄煤矿就紧靠在村子的东边,矿上的煤场与住户的最近距离不超过10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煤矿的两扇大铁栅门紧锁着,大门内的一排房前停放了几辆越野车,自称是看门的人说:“煤矿根本就没有生产,哪会发生事故?”而记者看到,在井口的煤场里有煤像两座小山一样堆在那里。

在青羊岭村,一位幸免于难、不愿透露姓名的矿工对记者说,12月5日晚上9点多,当班的他突然看到有七八个人从井下连滚带爬地跑上来,说井下9#层发生透水事故了。随后在晚10点左右,矿上通知所有当班的工人下班。平时每个班工人井数基本上都是三四十人,当时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应该有30余人,由于井下透水很突然,大部分人员来不及逃离。从看见有人跑上来通知下班的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上来的只有那几个人。

青羊岭村的村民们说,辛庄煤矿又叫后沟煤矿,是个有

几十年矿龄的老矿。自从煤矿承包给了个人后,矿主担心一旦出了矿难事故对本地矿工不好交代,现在就不招本地的工人来矿上班。每个班有多少人在井下作业,除了矿主和包工头,别人谁也不知道。据老王说,事故发生后,两个包工头也跑了,一直就没有再露过面。

“这个出事儿的煤矿手续不全,是个黑矿,一出事儿矿老板就跑了,水太大了,没人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嫂说,“一个班下去有好几个队,其中的9#层一个队出了事,听说四十个人只上来了8个人,基本上都是湖北人,一出事故包工头就通知把所有的人都弄走了,家属们都给弄到内蒙古了。”

矿方被指救援不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煤矿的办公区门前停了几辆高级越野车,井口的东侧一排平房前停放了一辆有标识的抢险救援车,井口前没有一个救援人员的身影,只看见有一个人在办公区的门前不停地打电话。矿工的宿舍门前都打开着,室内一片狼藉,窗台上还放有洗衣粉,床铺上散放着一些丢弃的旧衣物。

“半个月了没人救,如果这次事故遇难的矿工有本地人,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抢救法儿了。”陕西籍矿工家的大嫂对记者说,“要是有本地人的话,家属就会去政府告状,救援力度就会加大。9#层透水后水已经涨到6#层口了,那碗粗的水管抽出来的水没有直接排到地面上,又直接排进了6#层,而6#层和9#层还通着,抽出来的水又从6#层

漏到9#层,这么抽永远也抽不干。”她还说:“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也没有看见从外面调来大型设备进行救援,即使当时井下有活着的也错过了抢救时间。”

已上报还是瞒报?

辛庄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矿方是否按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了?有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救援行动?对此,记者于2008年12月23日分别在山阴县和朔州市对相关部门进行了采访。在山阴县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通讯组长吕建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这起事故上报了没有?报到哪一级了?

吕建全:已经上报到省市两级煤炭系统的相关单位,井下没有没有人也不知道。

记者:事故煤矿的性质?证照是否齐全?

吕:原来是乡办煤矿,后来变为股份制企业,证照是否齐全我不太清楚。

记者:对事故的责任人采取了什么控制措施?

吕:不清楚。

山阴县国土资源局矿产管理股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辛庄煤矿的采矿证有效期至2006年至2011年,核定产量为15万吨/年,可开采煤层为6#、9#、11#。对于此次事故的情况,他们声称不知情也未听说。

山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即山阴县煤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调度室的值班人员则称,他们没有听说2008年12月5日辛庄煤矿发生过事

故,也没有接到任何事故报告。

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朔州分局调度室张姓值班人员对记者说:“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但不是逐级上报的,是省局接到国家局一个领导的电话通知,说有人举报山阴县辛庄煤矿发生了一起死亡12人的煤矿事故。省局又电话通知我们去核实。”对于调查的结果,这位张姓值班人员说:“我们局里去过三四拨人,局长带着人也去过,经过调查没有发现事故迹象,我们以书面和电话的形式向省局汇报过了调查情况。事故调查是由山阴县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具体结果我不太清楚。”

深夜探寻运尸车未果

2008年12月23日晚上10点,知情人传来消息说,矿上井口处又有救援人员在打捞遇难者尸体,有可能趁夜色把尸体偷偷运出去,因为在前一日晚11时就把打捞上来的四具遇难者尸体偷偷运了出去,而且运尸车辆还挂着红布条。

记者随即驱车到了山西怀仁县吴家窑镇南,进入峙峰山公路西行约一公里处等候矿方拉运尸体的车辆。半小时后,看见一辆越野车在开往煤矿的路口停下来,不一会儿就看见在两辆拉煤车扬起的灰尘笼罩下,有一辆面包车从煤矿方向的土路迅速开上公路,记者驱车紧随其后。到了进山的岔路口时,前面的面包车看不见了。在这个路口往北是至左云县方向,往南是至怀仁县、山阴县和应县。

分析其可能要走的路线和方向后,记者决定先往南行,行

至不远处的公路收费站。那里值班的收费员说,没有看见记者要找的车辆从这里通过。猜测其有可能往反方向而去,继续往北就是山西左云县和内蒙古凉城县。记者又驱车原路返回往北前行至三公里处的左云县铺龙湾煤检站,煤检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曾有面包车过去,但无法确认就是记者要找的那辆。

遇难人数说法不一

据青羊岭村当地村民及租住在该村的矿工说,出水的煤层为9#层,当时正有一个班的湖北籍矿工在井下挖煤作业,事故发生后,住在村里及矿上的湖北籍人员一夜之间全部搬走。对井下的遇难人数,说法各有不同,有人说至少在12人以上,还有人说不低于30人。对此,山阴县政府方面一直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8年12月23日在山阴县政府大楼,记者请吕建全联系分管工业的县领导接受采访,吕建全说分管煤矿的杨副县长下乡检查乡村换届选举工作去了,联系不上。

2008年12月29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山阴县政府大楼见到了吕建全,请他联系县里主要领导就此次矿难的性质和目前的救援情况接受采访。吕建全对记者表示,县长参加煤炭订货会还没有回来,杨副县长也不在家。

截至2008年12月30日,矿井救援仍未结束,知情矿工告诉记者:“已经打捞出十六具遇难者尸体,至少还有五人下落不明。”据《中国经济时报》